

積極的民衆和社區參與

環保成功的關鍵

David M. Ingles 著

◎林淑英譯

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今天在這裏談論這個題目，並不是以一個環境專家的身份，而是正如各位一樣是關心世界萬物的民衆。

環境遭到破壞是一普遍又明顯易見的現象，最近在菲律賓派拿屈柏山 (Mt. Pinatubo) 發生的火山爆發即爲一例。在火山半徑四十公里的數千位菲律賓人皆受到波及而被迫遷徙，他們的家園傾圮，農作物收成和家畜數銳減，他們的希望也因此受挫。爆發後的第五天，火山的餘燼（即火山灰）也流注到新加坡，遠及到高棉，現在更擴散到澳洲和北美地區。真實地說，我們共同生存在一個地球村裏 (global village) 裏，只要其中的一個城市出了問題就等於是全世界出了問題。然而，環境破壞的景況也相對於人類所創造出的問題，貧窮、放任環境惡化、社會經濟不平等，過於富裕的生活型態等等皆是對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和自然資源產生不利影響的主要因素，讓以下這些數字來說明。亞洲開發中國家就顯露出一個真實却是痛苦的生活狀態，

在一九九〇年的五十三億全世界人口中，生存於亞太地區者共有三十億，也就是佔了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同年聯合國方案所能涵蓋的人口數估計達五億四千八百萬人，這些受益的民衆不但是上帝所眷顧的幸運兒，同樣也是需要被協助的。由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所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就曾指出，即使所有的社會情況都已達到了生產增加和改善的結果，亞洲地區仍然有五億人是處於被剝奪和赤貧的生活。

鄉村地區貧窮現象至爲嚴重。印度有百分之五十七的窮人都來自於鄉村的家庭，孟加拉共和國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皆是如此，在尼泊爾更有高於百分之九十五的貧窮人口。無庸置疑的，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地區獲得更多有關健康、水源和公共衛生服務的資源分配。貧窮的根本導因是資產分配不均，尤其是土地。一九七八年FAO研究中就指出在孟加拉、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全部的鄉村地區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民衆沒有土地，他們所

擁有的只是貧窮。當農業耕作仍然是這些邊緣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時，上述真實的情況已讓其受到傷害，因此愈來愈多的人只好生存在極少數精英的掌握之中。許多的資本和自然資源由一些少數的人所控制及決定，而這些所謂的精英 (elites) 通常是由軍事團體或政治黨派所構成，他們肆意攫用自然資源而無視於社會和環境的後果，只盲目追求短時間的物質獲得，在不公平的結構中貧窮的農民們將陷於此種窘況。這些窮人不僅在生產上很難提高，在保護自然資源上亦讓他們感到困擾，但爲什麼他們命該如此？他們只需在體系中獲得一點點利益即可有所改善，因此改革就被強烈的提出：在不公平的結構中，自然資源系統和貧富差距的增大將會帶來惡性循環式傷害。

ESCAP 一九九〇年經濟和社會調查報告中指出陳貧窮因爲性別和年齡而更形惡化，女性較男性易遭受到文化、社會、法律和經濟的阻礙——甚至男性窮人——這是無庸爭辯的。「貧窮的女性化」；



貧窮地區的環境嚴重惡化

…表示管理家務的女性在收入階層中是屬於最貧窮……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貧窮的受苦者包括了女性……在亞洲，家事管理由寡婦、離婚者、被遺棄或單身婦女擔任的比例就佔了所有家庭百分之十至二十」。吾人亦必同意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結論：如果實施制度改革以及只要將開發中國家花費的百分之一使用在窮人的人力發展上，則每個人均可脫離真正的貧窮。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在西元

二千年將會有一億的男性、女性和孩童成為乞丐。但是這些有限的人口依然使我們感覺遲鈍，多數的我們仍然無視於這些統計數據，但是，這些真實的苦難，期望匡正不公平制度的心痛，人類赤裸裸的需求，刺鼻的尿臭味和惡臭的貧民窟，從來不曾遠離我們。

事實上，情況的惡化常起因於冷漠、疲化、漠不關心，這也擴展到貧窮社會，他們被視為「正常」，人類的需求是不會因為同情憐憫而讓自己付出所有，而這是對此問題一個不公平和危險邊緣的觀點。再來看南北收入的懸殊，一九八〇年結束時，美國每人的收入是一九、七八〇美元（雖然紐約人可能會覺得與瑞士之二七、二六〇美元相較是見細的），而一個寮國却僅是一八〇美元。這樣差異的型態在亞洲亦可見到，日本人每年達到二一、〇四〇美元，但對不丹國而言，是一五〇美元。這其間甚大的差距不僅僅可以購買第二部車、成為夏日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的成員，亦可以購買到許多重要的項目：較佳的營養、較多的健康服務和較高的教育，職是之故，在進步國家的人們——只要在南方的少數精英——其平均壽命通常較貧窮國家的人長。這使得我們不禁要問道：在富裕的北半球和亞洲國家少數精英中有多少人享有生命的特權？光是在住宅、衣服甚至是食物的不同就足夠令人生氣的，

但窮人對生命本身的否定和提早瀕於死亡則是一種受到憎惡的不公平。在南亞地區，每一千人中就有一百七十位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在瑞典則是有十位，這些死亡的例子捆緊了我們的慈悲天性。它確實成為正義的訴求，因此NGO以一種積鬱已久的憤怒作了清晰而動人的表達，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堅持以這種方式來推動，我們將會造成一股旋風式的風潮。

退化的生態系統斷喪人類，而環境破壞更加深貧窮。一項估計指出百分之二十的赤貧者生存在亞洲邊緣土地上，他們有着低生產量和對環境破壞的高度感受，包括乾旱的土地、不肥沃的土壤和陡坡峭壁。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報告中說道，每年有一百八十萬公頃的熱帶森林被砍伐，這就意謂着平均每天有一千五百公頃、每小時有二〇八公畝或每分鐘有四公頃。印度一年內就損失了一百五十萬公頃，菲律賓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森林依然可以維持沒有妨害的伐木和進行採礦；在泰國幾乎達百分之三十，較少的是巴基斯坦，僅僅只有百分之五。這樣的滅亡從未停止，也因此不會對菲律賓天主教會會議（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使用非常嚴厲的批評感到驚訝——在我的觀念判斷——公然的抨擊這樣的掠奪。在他們的田園詩「萬物生命之輕」中寫道：「世界萬物任何

一部份的受損，尤其是生物的毀滅，已破壞了耶穌基督的形象」。

有價值的農田在每日既存的工廠、房屋和道路中逐漸被淹沒，正如同移居者史無前例的由鄉村的貧窮、都市的貧民窟逃離。急速擴張的酸土範圍加深了環境日益毀滅，在亞洲也很難去獲得真正被破壞的土地數字，FAO約略估計了一些指標，它們是：中國大陸三〇%；印度四九·八%；印尼二四%；寮國三五%；巴基斯坦一七·三%；菲律賓一六·八%；泰國三三·七%；越南四八·九%，對這些土地較小的地區是一個諷刺。就連土地較大的地區而言，其已灌溉土地也被宣告放棄，水氾濫和鹽化使得土壤變成貧瘠，在巴基斯坦印度河谷灌溉系統就是一個慘痛的例子。在過去十年間，地下水層已經由平均二十五公尺深而上升到接近地平面，正在破壞着穀物；將近有一千萬公頃的鄉間現在已經沉浸在水中或是海水中，而這些問題同樣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在亞洲估計每年約有一百萬公頃的不毛之地在成長着。以上的現象產生了生態的受難者，在生命支持體系中崩潰的受害者，他們的數目正在逐漸成長中，他們成為一九九〇年的「船民」(The boat people)——「能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如故」。

漁業資源同樣遭受到不可避免的剝奪。漁業管

理的疏忽在一九八〇年代被揭露出來，這可由一九七〇年代對資源的過度估計而預測此一後果，看到今天漁場的缺乏，高昂的價格和過度捕撈近海的漁產。原本可以為那些營養失調的窮人生產食物的生態遭到殘酷侵蝕後，更造成了另一種生態的罪惡；化學肥料的不當使用。「第三世界的國家在全世界殺蟲劑使用中僅佔百分之二十，但卻佔了全世界受到殺蟲劑侵蝕的一半，是全世界和殺蟲劑有關而告死亡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甚而這些化學藥劑的使用也由青綠的農田到了貧窮的區域。化學的污染也對環境造成另一種傷害，來自工業、空氣污染、船難、殺蟲劑外洩、礦坑的殘餘、無用的廢土，這些化學物質腐蝕着土壤、空氣與水，而一旦進入食物鏈中也能引起人類死亡。當來自富裕的人們，如汽車駕駛者、營養好的人和消費者製造大量的溫室氣體後，將使地球氣候轉壞和的幾近有百分之九十的氯氟碳化物(chloroflurocarbons)破壞着地球的保護性臭氧層。有車階級也應該對由汽車燃料中所發生的百分之三十三氯氟化物質負責任，連同高比例的空氣污染和酸雨。根據ECLC報告：「僅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工業化國家就消耗其自然資源的百分八十，和每年產生了百分之七十五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二百五十萬公頃體積噸數市有和工業荒地。」

解決第三世界外債的負荷時常要進行短期的發展政策，以協助其快速的獲得收益和利潤——這樣錯誤的趨勢對許多第三世界的自然資源基礎、生態學、長期經濟和社經情況最容易產生傷害，所以以下的現象不完全是巧合；第三世界的外債佔了百分之四十，全世界森林砍伐超過百分之六十五者皆發生在相同的十四個第三世界國家。(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象牙海岸、奈及利亞、薩伊、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和菲律賓)。吾人必須去承認和接受：主導全球的成長——中心發展策略在一個有限而相互依賴的世界是不恰當的，這樣的假設是基於對發展的觀察而成立的——不受限制的國際自由貿易和投資，由國內經濟到產品外銷的重新定位，依賴國外的借貸——已經描繪出生態災害陷入了持續和深沈的憂鬱之中。而我們又該如何抵擋這種生態災害的快速變化呢？我們必須要比政府更積極的找尋資源，許多政府的資源已經過度使用而呈現緊張的現象，一些更是缺乏可信性和適用性，今天留下的連帶問題是無力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感覺應該也可以讓我們更開放的看看什麼叫做「基層運動」(Movements from below)。

「這些都是革新的」，印尼學者蘇傑摩詞(Soedjatmoko)曾經說道，「並非由政府而來，而

是來自人民，爲了更好、更安全和公平的生活方式而表達他們的渴望」，這些基層運動形成人民的組織和NGO，在加深的貧窮和毀滅性的環境破壞中興起了數以百千的草根組織，也因此激發了一線希望。這些團體的人們瞭解生態破壞的最初開始情形，對他們而言，生態系統的損害意謂著燃木供應的品質低落、乾枯的泉源、受污染的河水、農田變成廢地、空曠的漁場、乾旱和間歇性豪雨造成的山洪。

就個別性而言，草根組織的行動可能被視為面對全球性環境問題時一個微不足道的事物，「微小可能是令人喜悅的，但它同時也是不顯著的」，因此，在組織中的成員都能够克服這樣的感覺，而各組織間的「繁花齊綻」對重新塑造地球則有潛在的影響。在亞洲的自助運動幾乎不會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他們努力從豐碩的亞洲文化和宗教中擷取精華——對自然的高度尊崇，非暴力的甘地（Ghandian）精神，和諧的傳統價值，對年老者的尊敬，對上帝和造物主的信念。希望之火又重新在草根組織中燃起，但因缺乏資源，人民的運動就只好依賴意識的建立和共同工作的傳統社區實務上。區可（Chipko）運動，世界上著名的社區森林運動，是由於其全然的勇氣才能有今日的發展。一九七三年三月，當一家木材公司在貧瘠的果彼瓦村

莊（Gopeshwar village）中砍伐木材時，奮不顧身的婦女和孩童趕在他們之前環抱著樹木，勇敢的護伐木者斧頭落在他們身上，今天區可已經贏得了生態管理、恢復和「生態發展」的資源保護。三百萬的斯里蘭卡人在 Sarvodaya Shramadana 參與一項社區發展運動，就結合了佛教教義和甘地精神，在臺灣和南韓，小農組織促進了資訊的流通和品種改良已經成爲農業生產基礎。SALT（Sloping Agriculture Land Technology）是

由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浸信會教友鄉村生活中心發展而來，主要是協助將貧瘠無用的丘陵地轉化成可以種植穀物和果樹的生產區域，同時也控制土壤的沖蝕。印尼一個名叫賓那斯瓦達亞（BINA SWADAYA）的NGO已經促成了農民團體的合作協調，提供一些進步的技術、農業服務和其他被信賴的計畫、方案等。八〇年初期，結合了NGO、學生、大眾傳播媒體、農民團體的資源而強制使泰國的 Nam Chuan Dam 結構解體，其曾經替代當地的民衆和數以千計公畝的豐饒土地淹沒水中。

這些屬於自然保護行動的成長極爲迅速，哈立本基金會（Haribon Foundation）主要係由科學家、環境學者和社會發展行動家組成，致力於保護正在快速消失的菲律賓森林，爲綠色批判菲律賓

的召集會鋪路，這是一個由大約五百個NGO和人民組織推動合宜發展的最大聯盟。其餘則需依靠同伴們來成就，格拉明銀行（Grameen Bank）推動孟加拉的「地下」經濟是靠著分配超過四十萬的小本貸款，平均一人約是六十元。亞洲的NGO聯盟過去二十年更加釐清了亞洲農村貧窮的價值和有關觀點。它首先帶動正式公開討論的風氣，諸如將在一九九二年所舉行的地球高層會議，以匯集NGO和PO對環境和發展的意見與觀念。雖然有著不同的利益、層級和派別，這些團體皆一同致力於倡導社會和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性，交還給社區和環境的管理權，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他們藉由尋找轉變來獲得發展的軌跡。然而相對的仍有一些阻礙，在任一國家的社會結構內銀行信用政策、土地保有政策及國際經濟因素遠大於合作社、女性的結合和窮人所創造的小農組織。爲了能順利成功，NGO應該對前面所提到的內容同時行動，尊重它們的歧異性，使用一種有目的的兩元化策略來嘗試停止或降低這樣的傷害，並且堅決的找出另一種替代的方法。

在一九八九年，對環境組織的關鍵發展是來自菲律賓所提的五項要素，因而形成了「馬尼拉宣言：人民參與支持發展」（Manila Declaration o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為 NGO 的行動提供意見, 這些主要的觀點是:

1. 成立內聚性聯盟: 聯盟必須超過階級和部門而在一個共享的理念之下成立。去承認在現有體制下的同盟者, 並且和其共同工作是極其重要的, 包括政府和國際的捐贈者和財政組織, 他們也享有相同的理念, NGO 應該開始跳出現在的脈絡, 並且勇敢的走出來, 也就是說利用貿易、學術、大眾傳播在所有盟友中發展出共識和支持, 這對解決環境問題而言是最重要的。

2. 動員社區力量: 創造一個能夠持續下去的社區需有能力的人民參與, 故要加強人民組織和自覺意識。人民力量最好是透過行動來建立, 這樣的行動可以被引導成兩個目標: 一是建立屬於自給自足具支持性的示範社區, 一是抵抗破壞社區和生態的政府、法人和其他機構的行動與政策, 發揮民衆力量以掌握他們自己的未來。

3. 擴展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大社區數: 單單組織人民是不夠的, 主要的目標是由下而上在具生產力、持續性的社區基礎上從事社區的

再造。需要公開證明這些倡導者可以達到政府和公共發展途徑所能成就的規模, 並且是可行的與可複製的。

4. 參與的再界定: 主權屬於民衆而非國家, 在真實的發展中任何外圍機構只不過是在一個社區推動、社區領導和社區自主過程中的參與者——是維繫社區的基本條件, 社區的管理和決定在於該方案的每一階段。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正如同地球高層會議對 NGO 的意義一樣, 已經成為大眾注目的焦點, 在其間持續的發展中呈現人民的渴望、觀點和經驗; 它提供民衆在正式的會議中面對環境問題的機會, 然而民衆的參與如果沒有個人自由的保證則又是毫無意義, 對於環境的恢復同樣地也要求一個有意識的民衆參與和尊重文化人種差異的民主過程。

5. 態度和習慣的改變: 民衆應該積極的深入瞭解我們如何在生存範圍內工作, 和人民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影響它們。應該有一種基於倫理而達成的允諾, 每個人立刻參與及支持「綠色消費者運動」, 並參加各種推動環境教育的正式和非正式方案。

要解決目前社會和環境危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應去思索一個持續性發展的完整策略。一九八〇年的教訓告誡我們若要發展絕對沒有捷徑, 除非結合了生態的支持、公平和參與, 否則發展策略將不會成功, 而這同樣亦可提供物質生活水準。如果我們想要生存, 我們應該注意這樣的提醒: 「人類的生命不是僅由個人豐富的財產組成」。我們必須消除地球資源是來自於祖先的概念; 替而代之的是, 我們要瞭解我們全是由造物主而來的, 為了確保人類仍能在地球繼續生存, 就算不去發展地球的資源, 每一世代都有義務去保護它。顯而易見的, 一個全新的心靈和倫理將成為人們行動的基礎, 人類必須要為和自然一個新的溝通而找尋屬於他們的方式, 我們必須有再次獲得自然奇蹟的期望, 我們別無選擇, 這是在人類社會生存的代價。

。 洛克斐勒大學著名微生物學家瑞都柏斯博士 (Dr. Rene Dubos) 主張一個新的社會倫理——幾乎是新的社會信仰, 「無論它會形成何種方式, 它應該基於人類與自然的和諧, 取代征服的壓迫」。